绪　论

英雄主义是贯穿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的价值追求。无论在晚清启蒙文学、“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国统区沦陷区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中，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文学中，都存在大量的书写英雄主义的文本。可以说，英雄叙事是现代中国文学始终未曾中断的一条线索。关注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是我们触摸历史的有效途径。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历史，催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英雄主义曾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不可忽视的精神动力。现代中国文学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很好地将历史进程中英雄主义的影像折射了出来。苦难历史中民族不屈的英雄精神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英雄气质，民族固有的生命力成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英雄品格。英雄叙事线索的存在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美学基调，同悲怆、焦虑一样，悲壮、崇高同样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美学基调之一。忽视了英雄叙事将使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既丧失掉文学发展固有的精神向度，又遮蔽掉文学文本固有的美学光彩。同时，我们也应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清醒地看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激变，在不同的文学时期，英雄主义的内涵在不断地发生变异，英雄叙事的主旨和美学风格也在不断地变化，这需要还原历史文化语境的具体分析和对文本的重新解读与阐释。

概念厘定：关于“英雄”概念和“英雄”文化的研究梳理，已经有学者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刘志伟在《“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一书中，从20世纪中西“英雄”文化研究的反思、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语义溯源、概念生成的文化背景、概念生成的年代等角度对“英雄”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述，著者全面辨析了中西“英雄”概念的含义及其异同，阐述了西方“英雄”文化研究对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生成的过程。刘志伟关于“英雄”问题的论述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此问题的较为系统完备的成果之一，我们认为，他最具学术价值的真知灼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作者论证了“英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概念，质疑了学术界套用西方“英雄”概念把中国上古时代说成是“英雄时代”的定论，指出：“紧接上古神话传说时代之后的先秦两汉时期，正当我国‘圣贤’概念生成和盛行时期，自为‘圣贤’时代；至汉末三国时期，中国古典‘英雄’概念方始真正形成，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英雄’时代，名副其实。中国‘英雄’时代晚于‘圣贤’时代，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① 二是作者对刘劭《人物志·英雄》和王粲《英雄记》

①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自序》，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研究的学术史综述和对这两篇古典文献的深入探讨。① 三是作者梳理了卡莱尔和罗曼·罗兰对西方“英雄”概念的改造，指出：卡莱尔的“英雄即伟人”的英雄观“对西方式‘英雄’概念的特指意义予以扩大以包容他所谓的后世其他‘英雄’，但他新的‘英雄’概念显然是继承传统‘英雄’概念而予以发展的。他所谓‘神话英雄’、‘先知英雄’，都具有神性特征”。② 著者从罗曼·罗兰“三大英雄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之一的《托尔斯泰传》文本代序中看到了“选择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这些文化巨匠做‘英雄’代表，是罗曼·罗兰认为与政治领袖等相比，文化巨人更足代表现代‘英雄’的人文主义理想”。③

应当说明的是，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就已经将但丁、莎士比亚、卢梭、彭斯等文化巨匠与神灵英雄、先知英雄、教士英雄、君王英雄相提并论了。另外，还应补充说明的是，爱默生和悉尼·胡克也对西方传统的“英雄”概念进行了改造。

爱默生在《论英雄主义》一文中说：“对于一切外在的恶，人在内心深处采取了一种好战的态度，并证实了他单枪匹马对付百万敌军的能力。灵魂深处的这种好战态度我们称

① 参见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0、35—53页。

② 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③ 刘志伟：《“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之为‘英雄主义’……英雄就是那样的一种平衡心灵，任何骚扰都动摇不了他的意志，好像只是欢天喜地地在自己的乐曲中前进，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和普天狂欢的环境里都是一样。英雄主义有一种不可理喻的东西；它似乎不知道别的灵魂和它气质相同；它骄傲；它的个性极强。”“英雄主义和人类的声音相矛盾，一度也和伟大善良的人们的声音相抵触。英雄主义就是对一种个性的神秘冲动的服从。”“自信是英雄主义的精髓。它是灵魂交战时的状态。它的终极目标就是极大的藐视虚伪和邪恶，有能力承受恶势力施加的一切灾难……它揶揄的是日常生活的渺小，它讥笑那种迷恋健康和财富的假谨慎。英雄主义就像普罗提诺一样几乎对自己的肉体也感到羞愧。”① 爱默生的贡献在于，他从灵魂状态来界定“英雄”和“英雄主义”，他清楚地看到了“英雄”和“英雄主义”与个性的关系，极力倡导个性主义的英雄主义．这说明爱默生的“英雄”概念剔除了卡莱尔“英雄”概念中所残存的神性色彩，使“英雄”和“英雄主义”彻底人化，并描述出“英雄”和“英雄主义”灵魂深处的种种表现形态。爱默生丰富了英雄主义的人文内涵。

悉尼·胡克从“英雄”与历史关系来界定“英雄”，他说：“所谓历史上的英雄就是那样一个人：在决定某一问题或事件上，起着压倒一切的影响：而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样的影响归因于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行动，或者，他的行动不像实际那样的话．则这一问题或事件的种种后果将会完全

① ［美］爱默生：《爱默生集》（上），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11、415页．

两样。’[①] 他区分了两种英雄人物，即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和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历史上，作为事变性人物（eventful man）看待的英雄和作为事变创造性人物（event-making man）看待的英雄，二者有所不同。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这个区别试图正确对待那个一般的信仰，即英雄的伟大不仅要凭他的所作所为如何，而且要凭他这个人本身如何。从这里开始，除非另有说明，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事变创造性人物而言。’[②] 可见，悉尼·胡克虽然没有否认事变性人物是英雄人物的一种，但他显然更愿意将英雄定位于事变创造性人物，他看重英雄超凡的品质和创造性天才。悉尼·胡克的《历史中的英雄》一书是西方现代学术史上最为科学完备的研究“英雄”问题的专著，它为我们理性地认识“英雄”与历史的关系奠定了科学的理论思维基础，但，他的“英雄”概念重视英雄对历史事件的创造性作用，实际上仍然具有将“英雄”伟人化的倾向。

20 世纪之初的梁启超对英雄观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英雄与文明的关系并论述了无名之英雄与有名之英雄的

①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 109 页

②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王清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年版，第 11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关系，强调无名之英雄对社会发展同样重要。梁启超对英雄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文明与英雄之比例》一文中，他既十分急切地呼唤英雄在中国的出世，但又说：“吾敢下一转语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世界之无英雄，实世界进步之征验也。一切众生皆成佛，则无所谓佛；一切常人皆为英雄，则无所谓英雄。……故必到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①梁启超在《无名之英雄》一文中先摘译了日本人德富苏峰所著《静思余录》中《无名之英雄》的几段，如“世若有爱英雄之人，请先爱此无名之英雄；若有欲顶礼于英雄脚下之人，请先顶礼此无名英雄之脚下；若有望英雄出世之人，请先望此无名英雄之出世。……无名之英雄真英雄哉！”等等，然后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今日中国之所以不振，患在无英雄，此义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无英雄之故，患在无无名之英雄，此义则能知之能言之者盖寡矣。……勿曰我不能为英雄，我虽不能为有名之英雄，未必不能为无名之英雄，天下人人皆为无名之英雄，则有名之英雄，必于是出焉矣。”②此文所表达的思想更值得我们重视，梁启超欲使国人都来做“无名之英雄”，参与到治国的行列，不仅国事的治理有赖于千万无名英雄，而且有名之英雄的产生也有赖于千万无名之英雄的存在，在梁启超的英雄观中已经存在着

① 《英雄与文明之比例》，原刊于 1902 年月 8 日《新民丛报》第 1 号，《饮冰室专集之二·自由书》第 85、86 页，见《饮冰室合集》第 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

② 《无名之英雄》，《饮冰室专集之二·自由书》第 48－50 页，见《饮冰室合集》第 6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

使英雄“群化”的思想理路。

本文所使用的“英雄”概念是对中外“英雄”理念整合、改造后的概念，它泛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切对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正面价值贡献的先进突出人物。它既包括历史伟人、文化巨匠，也不排除平民化、民间化的英雄、中国传统的侠义英雄，既注重“有名英雄”，也注重“无名英雄”，它既重视英雄的业绩，更看重英雄的个性与灵魂状态。我们关注的是英雄人物对历史中心事件的参与程度，而不是像悉尼·胡克那样只从英雄人物非凡的品质及其对历史的创造性作用来界定“英雄”的本质。我们从西方近、现代“英雄”概念中剔除过于极端的伟人化的倾向，并尽量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中剔除贵族化、帝王化的成分。我们不仅关注廖若晨星的历史主角，还关注众多的历史配角中的相对突出者。故而，我们是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英雄”概念的。我们认为：“英雄主义”作为伴随人类历史发展的精神追求的指向，它既源于人性的共性原则，又源于人性的个性原则，它既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实践活动，又依赖于个体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活力。英雄主义是以英雄崇拜为心理基础的人类价值观念的一种。英雄崇拜作为一种恒久的社会心理形态，其中既含有理性的价值判断，也含有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在英雄崇拜心理的形成过程中，正义、高尚、勇敢、力量、良知、智慧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超验、盲目的偶像崇拜情结和根深蒂固的“救星情结”也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英雄崇拜的社会心理被特定的意识形态所规范或利用时，它又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英雄主义中当然也含有理性和非理性两

种构成因素，同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种，它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

“英雄理念”是以英雄崇拜的社会文化心理为基础的理性地分析判断英雄人物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尺度。英雄理念常游走于政治、宗教、历史、哲学、伦理、文学、艺术之间，但却不绝对地依附于某一范畴的价值标准。英雄理念并不完全以历史行为的最终结果作为价值尺度。英雄理念具有强劲的历史传承性，当下的英雄理念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彻底抛弃传统的英雄理念而重构完全异质的英雄理念。镶嵌于民族记忆中的英雄形象，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符号，具有强大的统摄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不同的民族可以有共同崇敬的英雄，相互对峙的政治利益集团也可以拥有共同颂赞的英雄人物。由于英雄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大生命力的体现者，英雄崇拜中隐含着生命崇拜的意味，所以英雄理念中也常含有生命意识和生命哲学的成分。英雄理念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在历史的激变期和转型期，这种过渡性显得更为突出。英雄理念的相对稳定性取决于英雄人物身上合于普遍人性的精神素质；英雄理念的过渡性，则是历史除魅过程的必然结果，历史的发展不断地把上一时代加载于英雄身上的意识形态符码有选择地加以剔除，同时又为英雄人物打上新的意识形态的印记。

关于文学中的“英雄理念”问题，著名学者朱德发先生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在一系列长文中，对自晚清至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理念”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梳理和论述。这些具有创新性的论文是：《晚清至“五四”：新文学“英雄理念”的嬗变与钩沉》（《临

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的“英雄”理念》(《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英雄”理念的逻辑演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新时期文学的“英雄理念”考辨》(《山东文学》，2004年第7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英雄理念”的反思与阐释》(《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革命“赤潮”：左翼文学“英雄理念”的演义与反思》(见朱德发：《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210页)等，本文侧重对英雄叙事文本的解读与阐释，朱先生的上述论文为本文的论述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引。

本文的“英雄形象”概念是一个美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历史学、社会学概念。当我们在美学意义上使用“英雄形象”概念时，它与“卡里斯玛典型”这一概念有相通之处：“卡里斯玛人物．大致相当于所谓‘圣人’、‘英雄’、‘先知’、‘伟大人物’、‘杰出人物’、‘领袖’等,确实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种人物的力量的源泉，不是在于‘灵感’、‘天启’、‘神恩’等,而就在历史本身的运动中。”卡里斯玛典型是艺术符号系统创造的、位于人物结构中心的、与神圣历史动力源相接触的、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①] “英雄形象”在本文中专指叙事文本中的能体现我们整合改造后的“英雄”概念和“英雄理念”的艺术符号．即叙事文本中那些对社会文明和进步具有正面价值贡献的先进

① 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玛典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12页。

突出人物的艺术形象。

英雄叙事的两种形态：在现代人类社会英雄叙事中，存在两种既有深刻联系，又有深刻区别的叙事形态，即历史中的英雄叙事和文学中的英雄叙事。这是两种互相渗透、却不完全等值的英雄叙事形态。文学中的英雄叙事常常借助历史叙事的资源来阐释当代的价值追求，推演当代的历史（如历史小说、历史剧）。按新叙事学的观点，历史叙事也具有文学叙事的虚构性，因此历史中的英雄叙事同文学中的英雄叙事一样，也具有虚构性特点。在此，我们暂不讨论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相通性，在本文第二章第三节我们将涉及此问题。我们更关注的是历史中的英雄叙事与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的差异性。历史的记忆法则常常有选择性地把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对历史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作为英雄载入史册，此时的“英雄人物”只是一个历史学、社会学概念，它不具备审美的功能和审美的价值。历史叙事具有甄别历史人物的功能，却难以承担创造象征性“英雄形象”的任务。文学叙事也参与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人物”进行颂赞的大合唱，但它更善于为时代精神创设堪称“英雄形象”的象征符号，此时的“英雄形象”是不同于“英雄人物”的一个美学概念，它的功能不在于刻意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在于唤起接受者或崇高、或悲壮、或焦虑、或亢奋的审美情感。文学常利用象征或隐喻等手法把被历史叙事所舍弃掉的“零余者”置换为虚拟的“英雄形象”。历史叙事所创设的英雄谱系与文学叙事所创设的英雄谱系既有相重叠的部分，又有不相重叠的部分，还有相抵牾的部分。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是历史事件的创造者和亲历者，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则更多的是时代精神与普遍人性相结合的象征物。历史叙事只能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英雄”的命名，文学叙事则是不断地为英雄主义精神创造着虚拟的“英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叙事可以自由地切入到“英雄”（人）精神世界的最深层面，探查“英雄”（人）灵魂深处的奥秘，揭示“英雄”的行为与生命本能的关系，而历史叙事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是历史中的英雄叙事的审美性、虚拟性、隐喻性艺术化形态。文学英雄叙事比历史英雄叙事拥有更为自由、广阔的叙事时空。

审美范畴的英雄理念是历史范畴的英雄理念在文学文本中的延伸和拓展，前者比后者更为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当历史性英雄理念进入文学文本而成为审美性的英雄理念时，此时的英雄理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异。本来历史性“英雄”的确立就不具备绝对的价值尺度，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系统中都为“英雄”的加冕创设了不尽相同的价值标准。审美性的英雄理念在历史性英雄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英雄”的内涵，扩大了“英雄”的外延，甚至重塑了“英雄理念”。当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入审美领域时，他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象征性话语系统，他的象征性会超越、压倒其历史性，如三十年代鲁迅笔下的大禹、墨翟即是如此。历史英雄进入文学文本，实际上是文化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英雄崇拜）经过镜像式的放大，变成象征系统中的构成要素（英雄形象）。历史英雄进入文学文本常常以丧失其历史性为特征，这是因为叙事者的叙事指向不在于挖掘英雄人物的历史性，而在于借用历史英雄的名号来艺术地推演当代的历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被历史所筛选出的英雄及其精神具有强大的跨越时代的亲和力，当把一个民族作为整体的认知对象时，这种亲和力显得更为突出。文学中的英雄及其精神具有时代的象征性力量，在历史的断裂期他们迎合了历史断裂的要求。应该看到，由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社会激变，现代中国文学中有相当数量的英雄形象具有促使历史断裂的象征性力量。从世纪之初的黄克强、狄必攘，到狂人、夏瑜，再到汪中、沈之菲、施洵白、刘希坚，直到丁宁、蒋纯祖、印蒂……这些文本中的英雄形象都具有这种力量，他们反文化、反传统，乃至参与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暴力革命，他们是以创造新的历史为己任的。

历史上的英雄活在社会文化心理的延续中，文学中的英雄活在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心理感受中。审美领域的英雄的确立是作家个体经验与文化传统中的英雄崇拜、时代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其标准常常是个性化的。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庄子、老子、伯夷、叔齐一向被目为先贤、圣哲，按照卡莱尔对英雄的分类，他们应归入“文人英雄”一类，但在鲁迅先生的笔下，他们却成了被无情嘲讽的对象，在《故事新编》中，这四位先贤都没有获得英雄的荣耀。这显示出历史英雄的定位与文学中英雄定位的标准的差异。历史可以把某人定格为英雄，文学则可以突破历史的定格而寻求更为个性化的命名英雄的尺度。

左翼文学中的英雄是历史的、传统的英雄理念与现代性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抗战文学中的英雄则是民族主义英雄理念与现代性的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的产物。左翼至抗战时期英雄叙事的繁荣，充分证明了英雄叙事对于文学的不可或缺

的意义。英雄理念是文化心理构成的重要因素，它的释放、凸显、消解与时代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它在特定时期甚至具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力量。体现在文本中，英雄叙事在表达英雄崇拜这一“公性情”时，既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也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逆。但就左翼至抗战时期的英雄叙事来看，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的英雄叙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研究对象与研究重点：本文选取左翼至抗战时期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只研究小说和戏剧两种文体，尤其以小说为主，不涉及其他文体的英雄叙事。研究的时间区间大致限定于 1926 年至 1945 年；研究范围限定于左翼时期至抗战时期文学（包括国统区沦陷区抗战文学、解放区抗战文学）中的英雄叙事。研究对象不绝对地局限于左翼作家所创作的文本，也不绝对地拘泥于与抗战有直接关系的作品。之所以进行这样的界定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这一时间段是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时期，从英雄叙事的角度来看，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阶段看待。二是这一范围内的英雄叙事在文学史上具有原生态的意义，它上承启蒙英雄叙事话语，下接社会主义英雄叙事话语，既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又没有被政治体制所彻底规范化，它拥有丰富多样的英雄叙事形态，具有值得总结、梳理的价值和意义。三是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范围，有利于我们看清英雄叙事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而不至于把英雄叙事描述成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

文学英雄叙事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英雄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切

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在不断改造、利用文学英雄叙事；文学英雄叙事在被改造的同时，又以自己内在的尺度抗拒着改造，显示出自己特定的发展轨迹。我们一旦将英雄叙事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叙事形态来看待，就会发现这种叙事形态是与百年中国历史贴得最近、最具历史性的文学叙事形态。

英雄叙事的叙事形态、叙事特征和叙事模式是我们研究的又一个重点。通过对它们的探讨，找出隐含在文本中的叙事结构，以及叙事结构所包含的最本质的意义，从而发现英雄主义在文本显现中的内在逻辑，揭示出英雄叙事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规律。

史学线索：在辛亥革命前的晚清启蒙运动中，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早期启蒙者努力建构了以“国民”为本位，以“自由”为核心，以“新民”为指归的启蒙学说，为服务于其启蒙学说和启蒙事业，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从破除积重难返的现状、加速文明进程的需要出发，竭力呼唤“过渡时代英雄”的出现。1902 年前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续发表了《英雄与时势》、《豪杰之公脑》、《无名之英雄》、《文明与英雄之比例》等政论文章，发出对英雄的热切呼唤。梁启超还用不纯正的小说形式塑造了维新英雄黄克强的形象（《新中国未来记》）。黄克强组织“宪政党”，探寻政治体制改良的途径，他是梁启超“过渡时代英雄”观的形象化表述。一个世纪前的这个先驱者形象身上负载了过多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焦虑，他远非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也许黄克强的意义就在于他预示了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始终无法逃避与政治相联系的命运。刘鹗于 1903 年发表了《老残游

记》，小说中的老残只身游走于江湖，不靠勇力而靠思想和学识向社会之弊开战，在社会的局部环节上伸张正义。李欧梵认为：“老残是一个独特的英雄：一位不用刀剑，而用思想和草药去纠正社会不义的‘文侠’。”① 王德威也认为：老残“这一差强人意的独行侠形象，反而更为传神地重演了古老侠义精神的原型”。② 老残这一形象的独特性在于：他是获得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与古老的侠义英雄思想的奇妙结合体，在他身上既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又体现出古代侠义思想对历史时空的强大穿透力。这种英雄形象只能勉强生存于世纪之初的文学生态之中，当英雄理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时，老残这样的充满矛盾的英雄形象便失去了生存的依据，老残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代的现代游侠形象。 1905 年，陈天华作《狮子吼》，小说塑造了狄必攘、文明种、孙念祖、孙肖祖、孙绳祖、马世英等种族革命的英雄形象。狄必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豪杰，他联结革命党、图谋暴动，孙念祖、孙肖祖则赴美留学、旅欧考察，孙绳祖创办宣传革命的报纸，文明种游学内地、培养革命人才，革命党人马世英则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在这些满怀豪气的英雄人物身上已经具备了现代革命英雄的基本精神气质，现代革命英雄的活动空间和行为方式已得到初步显现。在上述三部小说中，蕴含了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的基本因子，包含了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最常见

①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73 页。

②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 页。

的主题原型，如：政治维新、革命实践、种族解放、精英意识、侠义精神等，随后的现代文学英雄叙事的主题指向基本上是上述主题原型的变种和演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带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以大无畏的先觉者的姿态承担了反封建、反传统的启蒙重任。在破坏痼疾重重的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借来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肯定自我意识，倡导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前的鲁迅十分崇尚尼采的超人哲学，此时，他的英雄理念与梁启超十分同调。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从张扬个性的角度，强调“超人”、“英哲”对社会进步无可替代的作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大力颂赞但丁、拜伦、拿破仑等英雄人物，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世。鲁迅的英雄理念既受到了卡莱尔和爱默生的深刻影响，又对中外英雄理论进行了整合（本文第三章第一节将专论之）。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中，塑造了先知先觉的个性主义英雄狂人的光辉形象，以及革命英雄夏瑜的形象。之后他又塑造了神灵英雄女娲和要熄灭长明灯的疯子等形象。鲁迅所塑造的大量英雄形象却出现在左翼时期他创作的历史小说中，如宴之敖者、后羿、大禹、墨子等。“五四”时期郭沫若的诗歌中充满了浪漫的英雄主义，他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我”、“天狗”等形象，包孕着吞吐宇宙、驰骋万里的豪壮气魄；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塑造了王昭君、卓文君、聂嫈三个反叛传统、伸张正义、慷慨凛然的女英雄形象。但就总体创作来看，“五四”文学并非英雄叙事繁荣的时期，正如刘纳所论：“代替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的英雄主义的，是五四文学的‘非英雄’的趋向。五四时代有自己的英雄，李大钊、陈独秀等便是。

但是，五四英雄没有在文学作品里得到相应表现。……文弱气质替代了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的尚武精神。”“五四作者不但以心理的‘弱化’增强了审美感受力，而且以尚弱用柔实现着情操的升华和对生命价值的重新选择。不同于‘身强志壮’的辛亥革命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将投入拯救祖国的‘战斗’看作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惟一路径，年轻的五四作者并未把自己全部的人生纳入‘战斗’的轨道”。①

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到上世纪 20 年代末，左翼文学运动开始占据文坛的主流地位。纵观左翼文学的发展史，我们会真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创作主体的生命旅程中，还是左翼作家们留给后人的文本中，都充满了关注社会、改造社会的英雄气质。“普罗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以历史转换时期的时代前驱者自居，急不可待地要求自己的主观意识‘翻然豹变’（郭沫若语），以促成文学发展的‘霹雳的突变’（李初梨语）。……他们的英雄态度使之不仅要作为时代的把握者，而且要充任时代的创造者。”②左翼作家把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投射到文本运作之中，形成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左翼作家既是被意识形态所塑形的对象，又是积极参与意识形态构建的主体，既是社会的改造者，又是被社会所改造的对象。此时的现代中国文学，上承“五四”文学的优良传统，更加贴近现实，更加强烈地体现出参与社会进程的叙事冲动，从“五四”文学时期

① 刘纳：《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77、378、380 页。

②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8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